

· 专题研究 ·

## 地域、学派与士人网络：论黄溥的师友渊源

慈波

(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宋元易代之际，婺州成为重要的文化分中心，在元代特有二元政治秩序之下，精英阶层的作用得以向地方扩散。黄溥青年游学时期，广泛与婺州精英群体接触，其交游网络以婺州地区为主，并逐步展拓至江浙行省。砥砺向学、激荡风义の群体活动，使黄溥形成了不名一师、和齐斟酌的思想特色，体现出婺学的包容和会特征。在尝试适应现有政治秩序的游宦经历中，黄溥初步形成了随意任运、出处无累的观念，既表现出对政权的认可，又显示出一定的疏离样貌，反映了元代江南士人在政治活动中的特定心态。

**关键词：**婺州；地方精英；士人；黄溥

南宋之后，士人阶层渐呈分化与下移趋势，学术文化的地域性色彩日益增强，地方文化特色的形成与这些士人的活动密切相关。个人的发展与时代文化氛围尤为切近，所谓“古人学问，必有师友渊源”，<sup>①</sup>从黄溥（1277-1357）的师承授受、朋辈交游中，正可见出地方精英群体对育新人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黄溥是元代中后期重要士人，《元史》称其与虞集、揭傒斯、柳贯齐名，号为“儒林四杰”，可见其在元代文坛的地位。关于黄溥的交游形态，许守泯《元代江南士人的社会网络——以金华黄溥为例》有较详细的论述。<sup>②</sup>本文考察的重点有所不同，主要考述黄溥进士及第、正式出仕之前的师友圈，试图结合婺州学术特点与地方精英活动，探讨其对黄溥产生的影响，并据此讨论元代江南士人在进身逼仄之际的仕宦心态。联系到黄溥及第为官后不佞不求、后期更多次主动弃官退居的行动，青年游学时期的士人交游与地域风气，对黄溥的影响似乎更具有决定意义。

### 一、师承授受与思想谱系

作为宋元时期学术思想的总结性著述，《宋元学案》将黄溥收入龙川学案及沧州诸儒学案，体现出对黄溥在儒学思想谱系中地位的认可。梁启超曾高度赞赏《宋元学案》“不定一尊”的特点，“各派各家乃至理学以外之学者，平等看待”；又认为它“注意师友渊源及地方的流别，每案皆先列一表，详举其师友弟子，以明思想渊源所自，又对于地方的关系多所说明，以明学术与环境相互的影响”。<sup>③</sup>这反映了此书力图历史性地反映儒学本身发展面貌的特点，而非以理学建构为目的而忽视学术思想的复杂性。黄溥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成熟过程正是这样不主一端、乡域特色明显的文化背景的生动体现。从黄溥问学的经历中，不难看出其转益多师、和齐斟酌的追求。

收稿日期：2013-02-04

作者简介：慈波，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宋元文史。

① 语出《诗眼》，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3页。

② 萧启庆主编《蒙元的历史与文化》，学生书局2001年版，第655-679页。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200页。

诸位儒师中对黄溥产生重大影响的当首推刘应龟，而这其实也有黄氏家学的渊源在。宋濂《金华黄先生行状》指出黄溥幼时“尝著《吊诸葛武侯辞》，前太学内舍刘君应龟，朝请府君之外孙也，见而叹曰：吾乡以文辞鸣者，喻叔齐兄弟尔。是子稍加工，不其与之抗衡乎？因留受业”，这是黄溥受业于刘氏的开始。<sup>①</sup>刘应龟（1244—1307），字元益，以其曾隐居石门山，人称山南先生，为黄梦炎之外孙。刘应龟咸淳年间游太学，马丞相奇其才，欲以女妻之，应龟不可，由是名称籍甚。<sup>②</sup>宋亡后卖药自晦，至元二十八年（1291）部使者强起为义乌教谕，后历月泉书院山长、杭州学正。黄溥“于先生为中表子侄行，自卯岁侍先生杖履”，<sup>③</sup>以此“受学于先生最久且亲”，<sup>④</sup>曾詮次刘应龟所自序的梦稿、痴稿、听雨留稿为《山南先生集》二十卷，并在刘应龟卒后为作行述。无论在为人、为学、为诗方面，刘应龟都为黄溥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作用，黄溥曾满怀感情地表示：“惟我曾祖左曹府君以文章家知名当世，先生以外孙实得其学。顾溥之蒙鄙劣弱，犹幸弗失身负贩技巧之列、以隕先业者，先生教也。先生之庇麻我厚矣。”<sup>⑤</sup>

在为学方面，刘应龟“潜心义理之学，每以古人自期”；<sup>⑥</sup>他“学本经济，而以简易为宗，读书务识其义趣，未尝牵引破碎，以给浮说”，为文则“雄肆俊拔，飚驶水飞，一出于己，无少贬以追世好”。<sup>⑦</sup>在诗歌创作方面尤其擅场，黄溥指出“吾里中前辈以诗名家者，推山南先生为巨擘”，而他在幼年即“知爱先生之诗，顾以材器劣弱，局量褊小，不敢窥其涯涘，徒有望洋而叹”。<sup>⑧</sup>由于诗作的散佚，《全宋诗》仅录其诗两首，今已很难考究其具体成就。七律《春日田园杂兴》在月泉吟社征集到的两千余卷诗作中列名第五，评语谓之“律细韵高”、“夔未易及”，可约略见其风致。黄溥集中录有《次韵山南先生遣兴二首》，从两人唱酬的情况来看，黄溥从刘应龟学诗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在《山南先生挽诗》中，黄溥以“仰惊乔岳失嶙峋，千载风流可复闻”来表达对刘应龟故去的痛悼，而“泪尽侯芭悲独立”则显然是以其衣钵传人自居了。

黄溥幼年又曾经问学于义乌王炎泽（1253—1332），“王氏自宋以来号为儒家，五世祖炎泽得朱、吕道学之传”，<sup>⑨</sup>黄溥则“自总角忝预弟子列”。王炎泽，字威仲，学者尊之为南陵先生，其母为通斋叶由庚之女。“先生少嗜书，稍长治举子业，颖出侪辈间。运去物改而场屋事废，因得专意探索圣贤之微旨。家庭所受既得其素；而通斋为外大父，又从徐文清公传考亭朱子之学”。“先生气貌充伟，而襟度疏畅，待人一本于诚，言论磊落，无所隐蔽，莫不敬服焉。为诸生讲说，务推明其大义，不事支离穿凿。文简质而主于理，诗极浑厚而间出奇语，不屑以雕刻求工也”。<sup>⑩</sup>叶由庚为徐侨弟子，而徐侨既曾受学于吕祖谦弟子叶邾，又复登朱子之门，故而王炎泽的儒学思想实际上带有吕氏与朱学的双重影响。

黄溥亦求学于石一鳌，《蒋君墓志铭》指出“溥弱冠时及石先生之门”，《饶州路儒学教授许君墓志铭》言“予幸获执弟子礼于石公”，所述即为这一经历。石一鳌（1230—1311），字晋卿，义乌人，“少从王世杰得徐侨之绪，淹贯经史，举乡贡进士。下笔为文章，如波涛汹涌，变化不可窥测。常典教邑庠，远近学者争趋至门执弟子礼，以求讲明圣贤性理之说、修己治人之要。及其门者皆历华跻

① 根据杨维桢《故翰林侍讲学士金华先生墓志铭》（《东淮子文集》卷二四，四部丛刊本。）的记载，其时黄溥年十三，则当为1289年。关于刘应龟生平详见黄溥《山南先生述》。

②（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二“杭州学正刘应龟”条言丞相为马骥。

③ 黄溥《绣川二妙集序》，《黄溥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页。《黄溥全集》为迄今收录黄溥诗文最全的版本，为便检核本文所引黄溥文字，标题皆从此本，文字、标断略有校改。

④ 黄溥《山南先生集后记》，《黄溥全集》，第282页。

⑤ 黄溥《山南先生述》，《黄溥全集》，第417—418页。

⑥（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二“杭州学正刘应龟”条，明天启刻本。

⑦ 黄溥《山南先生述》，《黄溥全集》，第417页。

⑧ 黄溥《绣川二妙集序》，《黄溥全集》，第264、265页。

⑨ 吴宽《明故中书舍人王君墓表》，《匏翁家藏集》卷七三，四部丛刊本。

⑩ 黄溥《南陵先生墓志铭》，《黄溥全集》，第483、482页。关于王炎泽生平，可参此文及王祎《南陵先生行述》。王祎为王炎泽孙，后复从黄溥问学，以文学节义名世。

显，故一鳌之名愈振。晚年覃思于《易》，著《（五）（互）言总论》十卷，甥黄溍铭其墓”。<sup>①</sup> 不过石一鳌知名于时，其最为时人所推重的却是举业经验，“然自秘丞君（王世杰）以来，惟用举子业相授受，故先生之门，名贤书、升学馆者相望”，“至其端绪之微，蕴奥之邃，世固未必知之也”。而黄溍入门较晚，感慨自己“于先生十卷之书，复未能与有闻焉。间乃掇其弃余，以充有司之求”，<sup>②</sup> 其间不免有谦抑的成分，但对石氏学术掩遏不扬的忧虑，却充分显现了对学术承传的关注。

在黄溍弱冠之后所师事的士人之中，影响最大的则非方凤莫属。方凤（1240 - 1321），字韶父，婺州浦江人，为宋代有名遗民。方凤并不仅仅以风义自高，他尤精于《诗》，“通毛、郑二家言”。<sup>③</sup> 黄溍为方凤入室弟子，“元贞丙申（1296），予幸获执弟子礼，见方先生于仙华山之下”。方凤对其期望甚殷，谆谆告诫他要砥德砺行，同时要培养根本。方凤原本就“好奖拔士，有一善，未尝不与之进”，<sup>④</sup> 于黄溍又属同乡前辈，所指授当尤为切近蔼然。黄溍集中所存多首两人赠答之作即是这一情谊的最好说明。

就师承授受而言，黄溍经历了转益多师的过程，其间所得自然有多少之别，而从而悟入的领域也各有侧重。像方凤、刘应龟以诗名世，黄溍从其所得诗学，就为他家所少。其诸多师执之间的共同之处尤其值得关注。一方面他们皆属于婺州地方士人，其居处环境、学系脉络都颇为相近；另一方面他们都经历了易代之变，其气节操守皆有可观。方凤坚定的遗民立场自不必说，其他人入元也多只是出任教职。这实际反映了婺州文人在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依违态度。在吕、朱等大儒相继沦谢之后，儒学的发展不得不面对大家缺失的境地，正是他们立足于乡域的学术活动，使得儒学的空间向中下层士人拓展，虽然高峰顿失，但不乏众声和鸣。婺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发展，而黄溍的受学经历恰好表明在学术承传的意义上，地方精英的价值所在。

而他们各自师承的复杂性，又使得黄溍本人的思想具有婺学的融合特征。《宋元学案》将方凤归入“龙川学案”，黄溍作为“方氏门人”，当然可以看做是龙川学术谱系的延续。王炎泽得其外祖叶由庚之传。叶由庚曾与何基、王柏辨析理学，因而作为“北山学侣”被列入“北山四先生学案”；又执经于徐侨，得传朱子之学；而徐侨又从学于吕祖谦门人叶邾。多重学缘的影响，在王炎泽身上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就石一鳌的学术源流来看，也表现出多重性因素。石一鳌师事王世杰，“初，徐文清公（徐侨）倡道丹溪上，及门者或仕或不仕，皆时间人。文清之学，盖亲得于考亭；而秘书丞王君世杰，则有得于文清者也。先生少受业于监榷货务都茶场王君若讷，既又从秘丞君游。学日以茂，实大而声远”。而他晚年论《易》则复出己见，“其为说不皆本于徐氏”。吴澄曾评石一鳌《易说》，以为“其说理之当、说象之工，盖于象学、理学，俱尝究心”，而其主旨与吴澄亦有不同，“予补朱义者也，石广程传者也。君释象，予亦释象，则皆程朱之所未言者。虽有不同，而言固各有当也”。<sup>⑤</sup> 作为石氏弟子，黄溍被列入“沧州诸儒学案”也具有学理上的充足理由。

从学术谱系来看，黄溍已处于诸派交汇的文化大背景之中，陈亮、吕祖谦、朱熹等本来颇有歧见的学术见解，在这一交互影响与吸纳之下，已渐趋混同。实际上婺学初创时期就缺乏一统的力量，黄溍对此有透彻的认识。黄溍所秉受的各家学说，正具备了这一特定儒学发展阶段的特征。不过众说纷纭当中，并非就没有共通的义理存在，“安知纷然不同之中，有混然大同者在耶？”<sup>⑥</sup> 师承各家自然有广取众长的好处，但也会增加多歧亡羊的困惑，只有能够在分歧的学说当中直探本源，把握根本义理进而形成自家体会，才能说是学有所成。从黄溍的学术思想来看，对“混然大同者”的追求，不失为把握其特点的重要方面。至于他在根本经术的同时，重文献、崇史学，则较多体现出吕学特点而多

① 《义乌县志》卷一四，明崇祯刻本。石一鳌生平详见黄溍《石先生墓表》。

② 黄溍《石先生墓表》，《黄溍全集》，第721页。

③ 宋濂《浦阳人物记》卷下“文学”之方凤传，知不足斋丛书本。

④ 胡翰《谢翱传》，《胡仲子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

⑤ 吴澄《石晋卿易说序》，《吴文正集》卷一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易说》与前及《互言总论》，或当为同一书。

⑥ 黄溍《送曹顺甫序》，《黄溍全集》，第237页。

属个人的领悟了。

## 二、交游耆旧与文采风义

黄溥始生而宋社遂屋，前贤故老多有落拓不偶而晦迹林野之间者，因而在问学之余得以交游耆旧。虽然与执经问业所得略殊，但是老辈仪刑尚在，即使是旬月之间，得以亲承警欬，也自能在风义与文章方面受其濡染。牟巘、方回、仇远皆与黄溥作忘年交好，这其中除了方凤、刘应龟的引荐之外，更多的应是所谓声气相近；自然也包含了耆旧诸人对黄溥的欣赏与期待。

黄溥与这些文坛宿老的交游与其求学过程是相互交错勾连的，早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得以结识盘峰先生孙潼发，“溥年十六七，即参陪于杖屦之末。先生古貌野服，高谈雄辨，四座尽倾。每语当世事及前代故实，亶亶不倦。然喜汲引后进，有如溥之无所肖似，犹不以凡子见遇，每折行辈以相倾下”。孙潼发（1244—1310），字帝锡，一字君文，桐庐人，咸淳四年（1268）进士，曾任衢州军事判官，“蜀名御史公绳祖侨寓是邦，先生暇日辄相与研究先儒性理之学，为士者往往闻其绪言而有所开悟”。宋亡后坚守不仕，以古人风节自期。《宋元学案》将其收入“北山四先生学案”。孙潼发在程钜夫求贤、留梦炎举荐的情况之下，能够秉持气节、自放于山水间，这一遗民精神给黄溥留下了深刻印象，“说者以为，人臣之义莫易于死节，莫难于去国，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难辨。宋之亡也，先生不在其位，而未始行乎患难；不降其志，而卒以明哲保身。从容于出处去就之际，而不至于屈辱。其善用晦者欤？盖人之难能，亦非人之所能辨。是用因其迹以推其心之所存，论次而表显之，庶百世之下有观感而兴起者焉”。<sup>①</sup>这一人格力量，对于身处异族入主中原朝代的黄溥来说，无法不对其出处观念产生影响。

而黄溥交游的耆旧当中，宋代遗民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月泉吟社诸贤即是显例。除了方凤之外，当年曾预评诗的吴思齐也成为黄溥的莫逆之交，“元贞丙申（1296）秋，予游仙华、宝掌，间因得拜先生浦阳江上。先生顾予喜曰：‘吾二十年择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谢君皋父。今皋父已矣，子乃能从吾游乎？子其遂为吾忘年交。’予谢不敢。先生盖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间岁辄一再会，会则必欢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间为予上下古今人物，使审所择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于予者哉！”<sup>②</sup>吴思齐（1238—1301）字子善，以任子入官，曾任嘉兴县丞；入元不仕，自号全归子。其祖吴深为陈亮婿，思齐能传家学，故《宋元学案》将其收入《龙川学案》。

吴思齐能诗，黄溥集中有《和吴赞府斋居十咏》，所咏为焦桐、蠹简、残画等，类皆残缺不全，正可以见其遗民心态。《书吴善父哀辞后》称他“中岁颇慕管幼安、陶渊明之为为人，因自放山水间，时与畸人静者探幽发奇，以泄其羁孤感郁之思”，着眼的也正是其志节。与方凤一样，诗歌其实只是陶写胸怀之具而已。龚开对方凤的诗歌有高度评价，“异时龚公圣予见先生于钱塘，览所赋诗，识以二十二言曰：‘由本论之，在人伦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言先生之诗者，无以易此矣”。<sup>③</sup>这未尝不可用来评价吴思齐的精神追求。正像四库馆臣所言，“盖凤泽畔行吟，往往眷念宗邦、不忘忠爱；开亦以遗民终老，故扬诩未免过情。然幽忧悲思、缠绵悱恻，虽亡国之音，固犹不失风人之义也”。<sup>④</sup>在后人的心目中，方凤、吴思齐、谢翱等宋遗民，“盖气节不群之士云”。<sup>⑤</sup>

在获交于乡域诸贤后，考虑到婺州地域的限制，再加上向学的决心，同时又有方凤诸人的荐引，黄溥开始漫游杭州，以求开拓心胸、增广学识。多年后他回忆起这一求学经历：“始予既知学，颇思自拔于流俗，而患夫穷乡下邑，块焉独处，无从考质以祛所惑。闻钱塘古会府，号称衣冠之聚，宿儒遗老犹有存者。则赢粮笥书，逾涛江而西，幸而有所接识。然以违亲越乡，不能久与居与游。间获聆

① 黄溥《盘峰先生墓表》，《黄溥全集》，第719、720页。黄溥另有七律《送孙君文判官丈归桐庐》。

② 黄溥《书吴善父哀辞后》，《黄溥全集》，第174页。

③ 黄溥《方先生诗集序》，《黄溥全集》，第228页。

④ 《存雅堂遗稿》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

⑤ 《浙江通志》卷四二《吴思齐传》，嘉靖四十年刻本。

绪言之一二，终未至尽大观而无憾也。”<sup>①</sup> 虽然这与镇日执经问学、盘旋坐隅的入门受业有所不同，但是老辈尚存、典型未远，其间教益也是颇值称道的，而这也成为此后黄潛向门生屡屡提及的话题。

从时间而言，游学钱塘当在仙华问学之后，黄潛称“潛以大德戊戌春，见先生于钱唐”，<sup>②</sup> 所言为1298年谒见龚开事，而与钱塘耆旧交游当即此期。龚开（1222-1304），字圣予，号翠岩，“淮阴人，少负才气，博学好古，尤邃经术。宋季与陆秀夫同居李庭芝幕府。宋亡来居吴下，节愈孤峻。尝作文天祥及秀夫传，吴莱称其不减迂、固”。<sup>③</sup> 龚开以志节称，亦善丹青，宋亡之后以画自给，“其胸中之磊落轩昂、峥嵘突兀者，时时发见于笔墨之所及”。<sup>④</sup> 所作两传尤负盛名，也正是其节义精神勃郁于中的体现，古人对其有高度评价：“此等文字当与天地古今同为不朽。百世之下一展卷之际，尚能使人酸楚悲愤不能已已者，何邪？亦以秉彝好德之心，千载一时，不容泯灭故也。”<sup>⑤</sup> 黄潛有诗云：“淮阴权奇士，髀肉老始消。长眉已雪色，頰颜尚红潮。朋游三数公，于焉共逍遥。平生经济策，忘言付诗瓢。”正是对龚开意气慷慨、寄情于诗的欣赏与追忆。

游学钱塘时所结识的耆旧与黄潛多有酬酢，如牟巘（1227-1311），“潛生也后，犹及拜于床下，而辱赠以言”。<sup>⑥</sup> 在其卒后，黄潛又有诗追挽，感慨“后生无复望仪刑，青史徒烦列姓名”。<sup>⑦</sup> 在多年之后，重展牟巘、方回赠诗，昔时的游从情形还不免形诸梦寐，“忆昔登堂三十载，梦想时复瞻眉须”，可惜的是老成零落，“两翁风流扫地无，文章光焰埋丘墟”。<sup>⑧</sup> 与仇远的交游似尤密切，黄潛曾陪其赴金陵并登石头城，有“平生一杯酒，及此慰飘零”的怀古与劝慰诗句。<sup>⑨</sup> 在《寄仇仁父先生》中则致慨于其入元之后生活的寥落，“一官十载尚沉沦，门巷萧萧白屋贫”。

从黄潛青年时期的游学经历而言，诗文唱酬所带来的文字方面的进益当属一面；而接闻绪论、获睹故国文献风流当属更为深隐、影响也更深远的一面。特别是耆旧诸人的气节与人格精神，直接影响到这一时期黄潛的政治态度。他曾不无忧虑地表示：“潛生于宋亡之后，犹及见昔之故家人物。其处而不出者，类皆以时异事殊，而有依隐玩世之心。后生小子，习而不察，谨厚之风，日益以衰。”<sup>⑩</sup> 显然耆旧典刑遗则未远，他们的政治立场，成为黄潛走上仕途之际首先要应对的最直接参照。

### 三、师友影响与出处选择

宋元朝代更迭，由异族王朝取代汉族王朝，不可避免对士人出处选择带来冲击。陈得芝先生曾对宋末理宗、度宗朝328名进士在宋元交替之际的事迹进行考察，发现其中殉国者占21.65%，入元不仕者占53.05%，而归降与仕元者仅占25.3%，其中还有部分人只是出任不入流品的低级教职，还有一些人则入仕未久即回归退隐。<sup>⑪</sup> 从中可以看到这一特定时段士人的政治选择，其间凸显的遗民精神是颇值得关注的现象。

黄潛的师友中，方凤、吴思齐、孙潼发、龚开等都是甚有影响的遗民，因而黄潛表示：“载念某之少也，从先生长者咏歌先王之道于宽闲寂寞之乡，将以是终其身”，<sup>⑫</sup> 考虑到身教的因素，实在是

① 黄潛《送汪生序》，《黄潛全集》，第244页。

② 黄潛《跋翠岩画》，《黄潛全集》，第193页。宋濂《金华黄先生行状》（《宋学士全集》卷二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3页。）言黄潛“弱冠西游钱唐，前代遗老与钜公宿学，先生咸得见之。于是，益闻近世文献之泽。暨还故居，从仙华山隐者方君凤游，为歌诗相倡和”，则游学钱塘在结识方凤之前，与其行迹似不合。

③（正德）《姑苏志》卷五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

④ 黄潛《跋翠岩画》，《黄潛全集》，第193页。

⑤ 孙志道《书龚圣予所撰文宋瑞陆秀夫二传后》，《宋遗民录》卷一〇，嘉靖程威刻本。

⑥ 黄潛《隆山牟先生文集序》，《黄潛全集》，第230页。

⑦ 黄潛《大卿牟公挽诗》其二，《黄潛全集》，第65页。

⑧ 黄潛《题陵阳牟公紫阳方公诗卷》，《黄潛全集》，第33页。

⑨ 黄潛《陪仇仁父先生登石头城》，《黄潛全集》，第44页。

⑩ 黄潛《山斋喻君墓志铭》，《黄潛全集》，第526页。

⑪ 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1-595页。

⑫ 黄潛《叶审言墓志铭》，《黄潛全集》，第484页。

比较自然的。虽然儒户的户计出身让黄溥在元代颇有儒冠误身的感慨,<sup>①</sup>但是“遗世岂予敢,匡时非我任”,<sup>②</sup>这一对同人的表白,明白昭示了黄溥对政权的刻意疏离。另一方面,元代儒士的地位相对于宋代士人的优渥处境而言,显然有霄壤之别。虽然不至于像“九儒十丐”那样极端,而且儒户还享有豁免科差杂役的权利,但是元初科举废止、重吏轻儒的现实,都极大限制了士人的出路。<sup>③</sup>揭傒斯所说的“士失其业、民坠其教、盗贼满野”,<sup>④</sup>一定程度上不失为元初社会的写照。在进身之途大为逼仄之际,以往被蔑视的皂隶,则成为士人的不得已选择,“今之由儒入吏者,肩相摩,袂相属”,<sup>⑤</sup>其间取舍对于世代业儒的黄溥而言,未始不构成心理上的障碍。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元朝统治局面的逐渐平稳,士人的心态也在不经意间发生递迁。早在黄溥出生的时候,江南就已纳入蒙元版图,他无需背负上前辈遗民那样的沉重心理包袱。元代“内北人而外南人”的政权特点对南方士人确有很大歧视,但随着文化政策的逐渐宽松,政府采取极具象征意义的延纳南方有名士人的举措,以及师友中人的入仕行为,都不免使得黄溥学优则仕的意识悄然滋长。黄溥的临歧彷徨最终因其好友叶审言的举荐而打破,起初他“绝无仕进意,其友叶君谨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1301),举教官”。<sup>⑥</sup>虽然他颇有晦迹渔樵的初衷,但并无决然遁世的意图,因而在叶审言的推动之下,黄溥略显被动地开始了登仕的尝试。

叶审言(1272-1346),字谨翁,金华人。曾祖叶邽,受业于吕祖谦。叶审言幼承家学,于书无所不读,卓然自立,父子互为师友。《宋元学案》将其一门列入“丽泽诸儒学案”,且专揭“叶氏家学”一目,足见其学术具有根本。叶审言弱冠举教官,历浦江、义乌教谕,升衢州明正书院山长,借授处州缙云县官政乡巡检,调晋江县主簿,迁吉水州学教授,后改调婺州路司狱,以瑞安同知致仕。叶审言早年颇有壮志,曾北走大都以求有遇,“叶君披短褐,志力何雄哉!北走叫阊阖,红尘指崔嵬”,<sup>⑦</sup>结果失意而归。教官向来被称为“冷官”,在元代其迁转尤为困难,叶审言即多年困顿于此。所交游者则多为名贤,“许谦、柳贯、张枢、黄溥咸乐与为友”。<sup>⑧</sup>黄溥集中今存多篇与其酬酢文字,并为之撰有墓铭。至于他力荐黄溥出任教职,则与元代教官的选任制度有关。路、州教授为品官,其选任较严格,元初往往要经由“学校公众”从“前进士人员”中推举,或者虽无出身,却“学问该博、年高德劭、为众所推、堪充教授”者,方可入选。<sup>⑨</sup>一般所能获得保举的,多为直学、教谕之类低级教职。因叶审言的教官身份,他力荐黄溥才学优长、堪任学职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不过教官的难以升迁也是出名的,“自直学至教授,中间待试、听除、守缺、给由,所历月日,前后三十余年,比至入流,已及致仕,情有可悯”。<sup>⑩</sup>和黄溥同时举为教官的曹顺甫二十余年之后方才升转为温州路学正,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黄溥经过试察中选,也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漫长的淹滞

① 《洞门黄氏宗谱》(民国丁丑重修本)卷二《文献历授散官始末》对黄溥出身、仕履有明晰记载,为史料价值极高之履历性质文件,文中明言黄溥“儒户出身”。黄溥自叙屡言及,如“予故诸生也,忝被官使”(《送应教谕诗序》)、“予故婺之诸生也”(《送李子贞序》)、“忝繇诸生,蒙恩锡第”(《谒先圣祝文》)、“溥忝繇诸生,与闻有政”(《诸暨州谒庙祝文·先登》)、“始公佐宪府,溥因公行部,以诸生礼见”(《深州知州致仕刘公墓志铭》),不一而足,皆可证黄溥当以儒户身份而入邑庠就学。

② 黄溥《寄方子践子发》,《黄溥全集》,第6页。方樵子发、方梓子践,俱方凤子,为黄溥友人。

③ 关于元代士人地位问题,详参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71-414页。

④ 揭傒斯《富州重修学记》,《揭文安公全集》卷一〇,四部丛刊本。

⑤ 黄溥《送宣公书院陈山长序》,《黄溥全集》,第237页。

⑥ 宋濂《行状》,《宋学士全集》,第913页。此说当本于黄溥《叶审言墓志铭》“审言力挽之出”。据危素《大元故文献黄公神道碑》,举教官为此年春。

⑦ 黄溥《赠叶审言别》,《黄溥全集》第7页。诗中有“尚念穷贱者,衡门守蒿莱”之句,当作于大德五年之前。据黄溥《明正书院田记》,皇庆初年(1312)叶审言为明正书院山长,则叶审言北上似在义乌教谕任满之后。诗中又言“十年今何官,茅屋歌苍苔。岂无琅玕树,凤飞故低徊”,可见是暂弃教职而去。吴师道《寄叶审言并简晋卿》云“燕尘越水旧衿裾,何事今年赋遂初”,亦与其北上行迹相合,并知其曾退隐。

⑧ 《两浙名贤录》卷二“瑞安州同知叶审言谨翁”,明天启刻本。

⑨ 《庙学典礼》卷二《学官格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同书卷三《正录任满给由》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后“江淮迤南教官,从本路儒学公众推举保申”,也强调了举荐者的身份。

⑩ 《元典章》卷九,吏部卷三“正录教谕直学”,元刻本。

岁月，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出任学官之后“予讫不调”。<sup>①</sup>在经过内心的艰难抉择之后，他终于决定由儒充吏了。

在元代儒士有限的入仕选择之中，吏职虽然或许难有“清流”之誉，但是比起教职来其升迁要容易得多，“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故儒多屈为吏”。<sup>②</sup>根据《行状》记载，大德七年（1303）黄溍“举宪吏”。<sup>③</sup>这应该是指黄溍应举为肃政廉访司书吏。元代儒人入吏有所谓“岁贡”制度，廉访司俗称宪司，按察司即其前身，至元二十八年（1291）诏令更名。宪吏职责颇重，而且两台监察院书吏需由各道宪司书吏选补，因而不失为从仕的捷径，其选用标准也较为严格。婺州为浙东海右道廉访司辖内，且为宪司治所。黄溍以应试之故到司，并作《上宪使书》以陈情。这一上书应该起到了作用，宋濂《行状》即称“就试皆中其选”。

在入吏之初，黄溍还颇想有所作为，他在《发金陵留别一二同志》中表示自己虽然违背初衷出仕，但不会弃置进道与为人的原则。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内心的失落也与日俱增。吏事繁剧、难以得志行道、不被同人理解，都让他心生悔意。这年的年底他就感慨自己出处不慎，“如何山中人，岁莫尘埃客”。<sup>④</sup>在《逸山过姚紫芝别业》中他慨然于昔是而今非，“念昔去岩壑，辍耕白云中。白云故无恙，我乃羞樊笼”。在与好友方子践的赠答中，更因有违夙约而多次表示愧疚，“相逢感畴昔，出处愧匆匆”，“向来常处士，早已负诸公”。<sup>⑤</sup>从《次韵子践秋社归岩南》中“时情冉冉心如醉，世议纷纷耳欲聋”、“蹉跎偶负平生约，已复人间岁一终”的沉吟，亦可看出黄溍在物议沸腾的舆论压力之下的痛苦与彷徨。最后他终于觉察仕非其时，“希世乖近务，慕隐余衷诚。愿言良时晚，庶保幽人贞”，<sup>⑥</sup>决定重归园田。

可以说，在元初科举未复、士人进身之阶逼仄的情况下，黄溍举教官、任宪吏，都是儒士的通常选择。从最初的被动入仕到最后的决意退隐，可以看出黄溍在师友影响之下对仕途的疏离之感，也能发现他对出处选择并不陷于偏执，而是相时而动，当仕则仕、当隐则隐。不消说游宦未遂的经历对黄溍而言是一次打击，特别是奔走红尘、供役吏职对于世代业儒的文士而言更带有心理上的折磨，但是这一尝试促使黄溍对仕进道路有了清醒的认识，也影响到此后他的宦海选择。多年以后他还不忘记指出：“某窃观昔人去就之际，出者或未能无累于物，处者或专务使影响昧昧、不闻于人。此二者皆过也。”在对待出处的态度上，过犹不及，故而君子执两用中，“进不徇人、退不绝物”，<sup>⑦</sup>这一理解和黄溍早年的游学游宦经历自应不无关联。

#### 四、小结

宋元易代对南方士人产生了重大冲击，由于蒙元贵族重根脚、崇世袭，“任官惟尚门第，非国人右族不轻授以爵位。至于南产，尤疏贱之，一官半职鲜有得者”。<sup>⑧</sup>社会各阶层重趋封闭，流动性较宋代大为减弱。即使仁宗时诏行科举，由于举额限制与对南人的歧视性规定，科举对于吸纳精英群体的意义也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精英阶层与其居住区域的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精英作用得以扩散。<sup>⑨</sup>黄溍青年游学时期，广泛与婺州精英群体接触，其交游网络以婺州地方为主，并逐步展拓至江浙行省。砥砺向学、激荡风义的群体活动，使黄溍形成了不名一师、和齐斟酌的思想特色，体现出婺学的包容和会特征。婺州作为南宋遗民群体的重要活动区域，地方精英的政治意识对黄溍产生了重要

① 黄溍《送曹顺甫序》，《黄溍全集》，第237页。

② 方孝孺《林君墓表》，《逊志斋集》卷二二，四部丛刊本。

③ 危素《神道碑》、杨维桢《墓志铭》皆作“举宪史”，文字虽略异而所指则相同。

④ 黄溍《晓望》，《黄溍全集》，第7页。

⑤ 黄溍《八咏楼遇方子践》、《杭州寄子践》，《黄溍全集》，第46页。

⑥ 黄溍《述怀》，《黄溍全集》，第5页。

⑦ 黄溍《秋江黄君墓志铭》，《黄溍全集》，第564页。

⑧ 瞿佑《归田诗话》下卷《年老还乡》，知不足斋丛书本。

⑨ 参牟复礼撰稿《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影响。在尝试适应现有政治秩序的游宦经历中，黄溍初步形成了随意任运、出处无累的观念，既表现出对政权的认可，又显示出一定的疏离样态。这既与南宋遗民的激越情绪有异，又与众多明初士人因政治高压而刻意避俗不同，反映出元代江南士人在政治活动中的特定心态。

责任编辑：李洪权

## District , Academic School and Literati Network: the Influences of Mentors on Huang Jin (黄溍)

CI Bo

*(Institute for Jiangnan Culture Studies ,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 Zhejiang , 321004 ,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Song – Yuan transition , Wuzhou (婺州) became an important cultural sub-center. Owing to the unique double political order of Yuan Dynasty , elites inclined to be more connected with local communities. In his youth , Huang Jin (黄溍) associated with a wide range of Wuzhou elite groups , and then gradually extended his mentor circle to Jiangzhe province. Through this group activity , Huang Jin's thoughts featured fusion and tolerance , which also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Wuzhou academic school. Attempting to adapt to existing political order , Huang Jin showed some recognition of the regime but meanwhile kept away from it. This to some degree reflects the mindsets of literati from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under the rule of Yuan Empire.

**Key words:** Wuzhou (婺州); local elite; literati; Huang Jin (黄溍)